



方 军 著

书信与日记里的新文化运动现场

 复旦大学出版社



书信与日记里的新文化运动现场

方 军◎著

 復旦大學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信与日记里的新文化运动现场/方军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 12
ISBN 978-7-309-10118-8

I. 书… II. 方… III. 五四运动-研究 IV. K261.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35702 号



书信与日记里的新文化运动现场

方军 著

责任编辑/孙晶 郑越文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6.75 字数 144 千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0118-8/K · 453

定价: 2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一 还原历史现场

王宏图*

近百年前在中华大地上异军突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中国现代文化的风貌,为其构筑起了骨骼经脉,其流风余韵迄今流播各界,而触及到的一系列枢纽性问题仍不时激发起人们争辩的兴趣与热情,挑战着人们的智慧,并叩问其道德良知的底线。而对“五四”的研究多年来也一直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门显学,各类研究论著一时间多如过江之鲫。方军兄的这本《书信与日记里的新文化运动现场》则独辟蹊径,它不是一部理论论辩色彩浓郁的高头讲章,也没有以爬罗剔抉之功穷源溯流,旁搜发掘到几许不为人知的孤证秘闻;相反,它起初只是作者开设的《新文化运动》课程的备课笔记。数年间,他以孜孜矻矻的毅力,持久不懈地充实、扩展,聚焦 1915 至 1917 新文化运动萌生躁动的三年,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办发展直至成熟为核心线索,围绕杂志前三卷上刊发的众多文字,并参阅胡适、吴虞、蔡元培、周作人等人的日记及诸多书信,精心编排网罗织缀各类文本,藉此鲜明地展示出民国初年那方生方死的年代特有的氛围气息,而陈独秀、胡适、蔡元培等穿梭其间的风云人物,其音容笑貌浮现

* 作者任职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在字里行间，恍然间呼之欲出。

和各类研究性专著习见的条分缕析、层层递进的论述方式不同，方君此书采用了近似编年体史书的写法，从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刊行第1卷时名为《青年杂志》）创刊肇始，收笔于1917年7月胡适抵达上海，中间穿插着若干对往事（可视为《新青年》的前史）的回溯。由于作者原本就无意写一部研究性著作，他在备课过程中与其说是从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中抽绎出了多少宏大叙事话语，不如说是专注于貌似琐屑、却能展示当时历史斑斓驳杂色彩的诸多细节。读罢全书，人们自然不会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认知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但从作者提供的众多丰富确凿的细节，对那段历史，尤其是宏大话语无法覆盖、囊括的诸多侧面，有了更为真切的体悟和理解。

历史著作在展现事件和人物时，从史料的筛选、辨别、排列等诸多环节，作者往往充当了举足轻重的中介。人们读到的所谓历史，其实并不是真实的历史现场的复现，而是众多的作者口中转述复述出来的。这一情形颇有点类似于早期虚构性小说的情形：作品文本中有着一个异常活跃的叙述者，他不仅介绍故事背景、主要人物，引领读者步入那个想象性的世界，而且在情节的推进过程中不时站出来指点江山，品头论足。在方君的著作中，作者这一原有的中介功能大大弱化了，他自觉自愿地隐匿起来，让那些历史人物通过各自的书信、日记、回忆录登台亮相，一展风采。自然，他还是在幕后有效地操控着场面，但它远不如以往那样直接、无所不在。

据作者夫子自道，他在此书中试图穿越时空，将历史现场的诸多声响、色彩、氛围、明暗光影变化一一栩栩如生地还原而出。

在此,他明显地受到了陈平原先生“触摸历史”的启悟。在陈平原先生看来,所谓的“触摸历史”是这样一种研究策略,“于文本中见历史,于细节处显精神”,它的具体操作方式“不外是借助细节,重建现场;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讨论的对象,包括有形的游行、杂志、大学、诗文集,也包括无形的思想、文体、经典、文学场。入口处小,开掘必须深,否则意义不大;不是所有琐琐碎碎的描述,都能指向成功的历史重建”^①。

当然,单纯地还原历史现场并不是作者的主旨,他有着自己明确的写作意图,他想借对《新青年》前三卷中各类文章的考察,展示出陈独秀本人思想的发展历程,数年间他奉行的编辑策略、方针与时俱进的演化,以及他与胡适因文字结缘相识的全过程。也正因为如此,本书提供的历史叙述不再只是一些宏大粗硕的线条,不再是对一个时期的文化氛围、思想潮流和发展趋向笼统抽象的描述,新兴思潮的萌生也不再是高悬在半空的神秘理念运作的结果,它从人们具体无比的生活环境中孕育、成长,最后分娩而出,蔚为大观。就以新文化运动两个领军人物陈独秀、胡适而言,他们起初素昧平生,因《新青年》杂志而结交。起先,他们对所谓“文学革命”的想法并不合拍,胡适的想法几乎被陈独秀全盘拒绝。由于当时通信往返耗时良久,胡适在未收到陈独秀回信之际更新了有关“文学革命”的想法。如果如今日这般通信发达,两人相隔太平洋也能即时互动,在头一个方案被陈摒弃后,胡适是否还会有勇气提出第二个方案,实在无法断定。一时间的阴差阳错造就了塑造历史的重大事件。方君详尽地描绘了他们间的书信交往,将当年的历史现场清晰地还原出来,其间的诡谲变幻,让读

① 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

者生发出诸多唏嘘感叹。

本书可谓还原历史现场的一个有益尝试。方君原本计划瞄准的是《新青年》杂志九卷，试图将 1915 至 1922 年与此相联的历史现场一一还原。此书只完成了前边三分之一，期待方君日后再再接再厉，将更为宏阔的历史现场呈现在读者面前。

2013 年 10 月

序二 于细微处求真

王晓欣*

陈独秀与胡适,20世纪前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位最主要的旗手。这两位安徽老乡,个性迥异,政见不同,又终身互为挚友。由于他们均对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他们的研究向来为学界所关注。近些年对陈独秀与胡适各自的评价已从革命史观和党派史观的羁绊中日益解脱出来,更为客观与全面。对他们两人的关系的研讨,也多有论著问世。方军先生的这本《书信与日记里的新文化运动现场》从一个新的切入点入手,以更加立体多彩的面貌为我们呈现了陈独秀和胡适前期的关系和发展。

1914—1917年间,是陈独秀与胡适关系中开始且重要的阶段,但以往文史学界评述陈独秀与胡适关系,或撰写二人各自的传记,对二人这一时期的交往均着墨较少,本书在这方面做了详尽的充实。全书主要从两条线展开:一条是陈独秀与《新青年》杂志:从陈氏最初坚守输入文明,坚持“政治正确”到后来“安忍默不一言”;从最初矢志学理的输入到走出无物之阵;从绝望后消极的“自觉心”到痛定后积极的“自觉”义;从伦理革命一枝独秀到伦理

* 作者任职于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革命和文学革命花开两朵；从延聘名家到借助《通信》栏挖掘作者等等，作者从当时的政治社会背景入手，一步一步呈现出了陈独秀“老革命党”的本来面貌。另一条是胡适的崛起：从胡氏在美学政治和学术上的立场，从陈氏与其结识和提携，从胡氏的一度困窘到归国腾达，从陈、胡对文学革命的同中之异等，亦一层一层表露出胡适“文学革命”理念的形成和心路历程。

近现代历史研究的一个难点是资料浩如烟海，由于资料记录者的背景、立场、观点不同，梳理和鉴别殊为不易，怎样求真求实？方军本书写作的思路是力图揭示一个“历史现场”。其史料取径有三：一是“实地”的；二是“文献”的；三是“心理”的。所谓“实地”的，即作者史料多采当时的《新青年》（包括《青年杂志》）中的文字，尽量不用稍后编的《独秀文存》和《胡适文存》，以尽量还原最原始的细节信息。在“文献”方面，书中大量使用了陈、胡及相关时人的书信和日记，从书信和日记的角度揭示陈、胡说过什么样的话，做过什么样的事显然更为可信。本书特别重视史料细微处所隐含的“心理”，如对1916年2月和8月陈、胡来往信件和以后胡适自己对信的删削改动而做的复原和解读；对1917年年初，胡适从“贫”病交加，前路渺茫情境下的悲凉到后来收到国内陈独秀等三封信和《新青年》2卷5号杂志后的狂喜等，心理分析均很到位。

本书以三年编年的时间顺序为纵轴，以国家、社会、政治背景和文人关系来横向展开，细致剖析，段落连贯，文笔流畅生动，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画面感，其中亦不乏引人掩卷长思之处，相信读者读起来会很有兴味。

本书作者方军，1993—1997年就读安徽大学历史系，1997年

9月考入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中国古代史专业,由我指导攻读硕士研究生。2000年7月研究生毕业后,一直任教于温州中学,在中教岗位上踏实工作,取得不俗成绩,现为高级教师,先后获得过浙江省说课评比一等奖、浙江省优质课评比一等奖。参编《浙江省会考总复习导引·历史》,《浙江省高考总复习导引·历史》,《浙江省高考命题解析·文科综合·历史》等教学用书,在《历史教学(中学版)》等刊物发表文章若干。2006年还获得浙江省教坛新秀称号。众所周知,中学教师的工作是辛苦而又琐碎的,很多人因陷于基础知识教学和应试任务而再无精力去做另外的研讨。方军在出色的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却一直没有放松研习和思考。他一直以“学术情怀、中学立场”来鞭策自己,一方面心存教科书及其课程标准,心系中学课堂和课堂中的学生,一方面通过研究扩展自己的学术视野,使中学生在教科书之外能够更深入全面的阅读历史真相,拓展眼界和培养历史情怀。这本书原本出自方军讲授《新文化运动》课程的备课手记,由于上述他对自己一贯的学术要求,在备课时自然有了许多的发见和体会,这也构成了本书的特色。我认为方军将中学教学与研究结合的这种尝试是很有意义的,衷心希望他今后能有更多成果问世。

2013年8月于南开大学西南村寓所

前言

每每想起胡适和江冬秀这两个皖南人在厨房里叽里呱啦，而在厨房外的皖北人唐德刚听得稀里哗啦一幕时，我就想，要是我这个皖南人在，可就顿觉噤里啪啦了。读着胡适写给胡母的信：“所带之塌果很好，昨天中午吃了三个，今天中午吃了两个……”^①外间人简直不知“塌果”为何物，但我觉得分外亲切，因为这个音译不需要任何一点“烟土披里纯”。对陈独秀的兴趣始于读《实庵自传》，觉得很像一个混世魔王。其后时常买些他们自著的或研究他们的书来看，脑海中逐渐形成了些关乎他们的或清晰或模糊的影像。

因此之故，2005年市里组织优质课评比，我选了《新文化运动》一课，其后又继续备战省里的优质课比赛，还是准备这节课。新文化运动有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作为一个专门的词条，不要说在《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中找不到，就是在《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二版）中也找不到。好像新文化运动一准备拿话筒，就被五四运动一把抢过去了。无怪乎耿云志先生在纪念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在此以前，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在海外各地，都只举行过纪念‘五四’的学术研讨会，而从

^① 胡适：《致母亲》（1917年8月3日），载《胡适书信集（上册）》（耿云志、欧阳哲生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99页。

未闻有专门纪念新文化运动的学术研讨会。”^①但是随便拿本通行的《中国近代史》，没有不留一节给它的。

我在准备优质课的近一年时间里，围绕这节课像塌“塌果”一样翻来覆去，弄了不下20个版本。这些年来，每上到这一课，依然充满激情，因为“新文化运动”就应该是“新”的。因此，经年累积，数量颇丰，总想整理出来，重要的是需要找到一条较为合适的路径。

“章实斋第一次和戴东原的见面和谈话，在实斋的学术生命中是一件头等重要的事件。”^②这是余英时先生著作《戴震与章学诚》正式开篇的一句话。再一次读到这句话，我被电着了。第一，余先生“亲与了”那第一次谈话；第二，余先生“亲历了”实斋的整个学术生命。这不就是“回到历史现场”吗？回到历史现场，注定是一条充满诱惑的光荣的荆棘路。

桑兵先生这样解释“回到历史现场”，“所谓回到历史现场，不仅要回到一定的空间位置，回到事情发生的那个时代或那段时间，而且要设法回到当时当地，回到事情正在发生的过程之中”，“就是要和历史人物一起经历其事，而且不是作为旁观者，也不仅仅是参与者之一，而是和所有亲历者一起经历他们各自所经历的全部过程”。考古学的观察地层，人类学的田野调查都在逼近现场，那么历史学呢？桑兵先生指出，对历史学而言，“不宜神游冥想以表同情”，“能否回到历史现场，以及能够在何种程度上重返，

① 耿云志：《开放的文化观念——纪念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开会辞》，载《开放的文化观念及其他》（陈于武编），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②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7页。

不能不受制于史料的遗存状况及其开发潜力”^①。

陈平原先生提出的“触摸历史”其实也是“回到历史现场”，其要素是“借助细节，重建现场；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他通过讨论“有形的游行、杂志、大学、诗文集”和“无形的思想、文体、经典、文学场”成功地“进入‘五四’”^②。

余英时先生的上述著作事实上提供了回归历史现场的另一利器。余先生说：“学术思想史上有许多重要的理论，从正面去看，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似无隙可寻。而一考其立说时的特殊心理背景，则往往发现其中有待发之复，而且关系甚大者。实斋《文史通义》中的若干中心理论便可以从这一方面去重新加以分析。而东原平生持论屡变，其先后不同之深微处，也只有揭开了这层心理的纱幕之后才能仔细地辨认得出来。”故他的这本书从“历史的和心理的两个角度去勾划出东原和实斋两人的思想侧影。这在取径上与传统的思想史颇不相同，因为后者主要是从学派传承、师友渊源各方面去摄取思想家的正面像。但侧影不但和正面像相冲突，而且可补充它的不足”^③。针对章学诚有意识地夸大黄宗羲的浙东之学，又有意识地夸说浙东之儒言性命“必究于史”，余先生甚至提出：“在实斋的潜意识里，这种夸张也许反而是十分真实的，……我们必不可把历史真实和心理真实混为一谈。”^④

名家关于“回到历史现场”的阐述与实践，私意以为提供了“回到历史现场”的三件利器：一是“实地”；二是“文献”；三是“心

① 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24—127页。

② 陈平原：《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第5页。

③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6页。

④ 同上书，第72页。

理”。而能否到达,在多大程度上到达则需依靠使用利器的作者。桑兵先生所谓“史料的遗存状况及其开发潜力”事实上已经包含着作者的“开发潜力”。

虽不能至,心向往之。在写作中,我尝试使用上述三件利器。一是“实地”。第一块“实地”是尽量直接使用《新青年》(包括《青年杂志》),包括文字和其他信息。“文存”的某些地方或有过改动,比如2卷2号《通信》栏,胡适致陈独秀的信中点名批评谢无量,但在《胡适文存》中已改成“某君”;而杂志的封面、目录排序、广告、插页、字体大小、是否加圈点(着重号)等又是包括“文存”在内的别处所无从见到的。第二块“实地”是特别关注陈独秀在上海,而胡适在纽约这个事实。这种空间距离产生了严重的信息反馈不对等,我认为这个可能直接关乎胡适的命运。

二是“文献”。我认为书信和日记无疑是到达现场最有效的通行证。因为在通常情况下,书信和日记可表明不是我想让他们去做什么样的事,而是他们确做过那样的事;不是我想让他们说什么样的话,而是他们确说过那样的话。胡适的留学日记和往来书信最为主要,除此之外,日记方面有《吴虞日记》、《蔡元培日记》、《周作人日记》等,书信方面则主要依靠《新青年》的《通信》栏,偶涉《甲寅》的《通讯》栏。当然,如果能够牵涉到一点不是我想让他们怎样地去思想,而是他们确曾经那样去思想的话,就算是对我额外的奖赏了。

三是“心理”。这方面以关乎胡适处尤多,如胡适将1916年2月3日致陈独秀信,删削成只剩下谈译书事。又如1917年1、2月间,胡适可以说是“贫”病交加,加之前路渺茫,在此情境下,悲从中来。一俟2、3月间收到国内三封装满喜讯的信和《新青年》2卷

5号后,喜不自禁。再如1921年他借给《吴虞文录》作序之时,顺便贩卖私盐,刺了陈独秀一下。

由此,形成了拙稿的两条主线。一条是围绕陈独秀及其主编的《新青年》杂志,分析当日政治社会是如何一步一步地逼出陈独秀这个老革命党的真实一面,而这种真实一一还原的过程也正是杂志旨趣发生变化的过程。试以陈独秀设计的伦理革命路线图为例,我认为陈独秀在学理层面,讲到《吾人之最后觉悟》已经技穷了,因此他设计一条路线:由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引出反孔,再由易白沙先对孔子进行平议(注意是平议而非评议),随后陈独秀自己找了个活靶子——康有为来打,一举走出“无物之阵”,再由吴虞来担任“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疵”的先锋主将,这也是吴虞自登陆《新青年》后,其文章基本上排第二篇的原因。头条当然是陈独秀的。

另一条是再现陈独秀与胡适从文字结缘到间接联系再到直接联系,最后到面对面的全过程。《甲寅》时期陈、胡结下文字之缘;《青年杂志》创办后,陈独秀通过汪孟邹频频向胡适约稿;1916年2月3日胡适致信陈独秀,二人开始直接联系;1917年7月中旬二人终于面对面。但就我眼界所及,以往的研究语焉不详,以致我们忽略了太平洋上的不太平。我认为陈独秀和胡适好似两条平行线,再有想象力的人也很难想象出他们会相交,而那最初的相交也是极其不平静的。试举一例,以往研究往往轻松放过了胡适1916年2月3日致陈独秀的信,事实上日记中虽然题名《论译书事致陈独秀》,但胡适自己留了好多省略号。我通过陈独秀1916年8月13日致胡适信和胡适8月21日致陈独秀这两通信,复原了2月3日的信,指出谈文学革命“三事”(须言之有物,须讲

求文法,不避“文之文字”)才是这封信的重点,译书事不过是余事。陈独秀6个月后,即8月13日的回信几乎全盘否定了胡适关于文学革命的设想,也几乎成了致胡适于死地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文学革命事在留美中国学生界已经是只有反对者,根本就没有支持者了。但因为二人之间隔着广袤的太平洋,使得胡适在尚未收到这封信的情况下,就激动万分地在8月21日把他刚到手的文学革命“八事”报告了陈独秀。假如在收到陈独秀信后,不知他还有没有勇气提文学革命“八事”。当然,陈独秀全盘否定2月3日的“三事”,原因是偏偏胡适所提的这“三事”全不当他法眼。这种空间的距离,这种信息反馈的不对等也许可算作胡适口述自传中所特别强调的促成文学革命的偶然事件之一吧^①。因此这条主线,或可以径直称作胡适的崛起。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最先的计划是想把《新青年》全九卷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这也就意味着时间跨度是1915—1922年,但因为学力和积累的关系,面对1918年以来更为复杂的人物图谱、更为庞杂的论题主题、更为纠结的政治社会而难以为继,只好留待他日了。所幸1915—1917年这三年还算自成段落。

最后我想谈一点作为一个中学历史教师的身份认同问题。我一直觉得,当前中学历史“教”与“研”似乎各存在着一个诡论:中学历史“教”的诡论在于,是满足于“以客观介绍一些常识性知识为好,尽量不要做主观性的价值评价”,“全面的解读与评价可以留待学生在今后的读书和思考中去逐步解决”^②,还是做到“善

^① 胡适:《口述自传》,载《胡适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30页。

^② 张分田:《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先秦部分的若干建议》,载《历史教学》(上半月)2007年第1期。

于把历史故事化地讲出来”，“要有热情和关怀，深知历史的意义在哪里”，“拥有准确的知识，能够向学生清楚地叙述出历史的过程”^①呢？

中学历史“研”的诡论在于，其一，虽然你研读了那么多著作，却提不出什么真知灼见，不过是晒晒书本，嚼饭哺人，何苦来着？其二，既然你在教学过程中大量引证名家的论述，那么直接用名家著作取代教科书可也，教科书有何存在的必要呢？

我想，就“教”的方面来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想做后者，即使如前者，要做到“客观介绍”，也需要我们下工夫去“研”，中学的“研”固不同于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就历史学科本体性知识而言，不需要我们提出什么真知灼见，事实上我们也无能为力。我们的“研”更多是为了服务于我们的“教”。我始终不认为可以用史家的著作来直接取代教科书，即使杰出如布罗代尔，他曾专门为法国中学生编写过一本文明史，但后来居然没有被法国教育当局采用^②。

这也就给了我们这个群体一个定位，让我们得以消解上述诡论：我们心存教科书和居于它上位的课程标准，我们心系中学课堂和课堂中的学生，我们通过扩展自己的学术视野，尽量把有意义的历史传达给聆听的他们，让他们中心有所动，眼界有所开，于历史仿佛有通感，于人生仿佛有体悟。由此，“学术情怀、中学立场”这八个字当成为我们追求的路向，也当成为我们这个群体自赎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小书只是我一个大胆的尝试罢了。

① 《葛兆光谈“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载《历史教学》（上半月）2007年第1期。

② 马克垚：《导言》，载《世界文明史》（马克垚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页。